

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

(抽印本)

大陸學界有關西南軍閥史研究  
的回顧與展望

楊 維 真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

臺灣 臺北

# 大陸學界有關西南軍閥史研究 的回顧與展望

楊維真\*

## 壹、前言

清朝自太平軍興起後，由於地方主義抬頭，中央權威衰退，形成外重內輕現象，因而加速政權之崩解。民國成立後，基本上賡續清季以來的政象，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始終極不穩定，以致政局動盪不安。袁世凱當政時期，曾努力扭轉此種「外重內輕」之現象，並得到短暫的統一，可是不久即隨袁的去世而告結束。此後大小軍人開始登上政治舞臺，彼等擁有自己的武力，佔據若干地盤，並且在勢力所及的地區實行個人專制的直接軍事統治，成為政局實際的主導者。從一九一六年護國之役後，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止，這段時期史家稱之為「軍閥統治時期」，全國無論南北，均籠罩在軍閥統治的陰影下，形成中國現代史上一種很特殊的現象。

有關軍閥的研究，長久以來一直未曾受到學術界應有的重視。其造成的因素雖多，但最重要的是軍閥及其身處的時代，在歷史上的意義並未完全被人瞭解的緣故。<sup>1</sup>所以軍閥史的研究一直未能開展，也因此成為學術界尚待耕耘的範疇之一。這種現象一直到一九六六年美國學者薛立敦（James E.

\*中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sup>1</sup> 陳志讓：〈中國軍閥派系詮釋〉，轉刊於張五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五輯——軍閥政治（臺北：聯經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初版），頁三。

南軍閥史研究的熱潮。長期以來，由於受到政治立場及意識型態框架的影響，軍閥在大陸學界一直被視為負面的反動人物，從而限制了對軍閥史研究的開展。直至七〇年代末期，隨著四人幫倒臺、鄧小平復出，政治局勢稍有開放。尤其近十餘年來中共爲了修撰「中華民國史」，因而各種官私檔案、大量史料文獻陸續整理刊佈，加上西南各省地方史研究的興盛，遂使大陸學界興起西南軍閥史研究的風氣，並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蔚爲大陸史學研究的一個新園地。究其實，西南軍閥史在大陸學界中，還是一個新興的研究課題。<sup>8</sup>一九七九年春，大陸學界於四川成都召開「中國歷史學規劃會議」。會議期間，由與會的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湖南等六省區代表提出組織「西南軍閥史研究會」的建議，以做爲從事西南軍閥史研究的專業學術團體。經一年多的籌備工作，川、滇、黔、桂、粵、湘六省區從事近現代史研究教學的學者，終於在一九八〇年四月於四川成都成立了「西南軍閥史研究會」，以推動西南軍閥史的研究工作。<sup>9</sup>同時依據該研究會的〈簡章〉規定及理事會決議，亦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在成都召開西南軍閥史第一次學術討論會，並於會後選編年會論文出版《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一輯。此後乃形成定制，由相關省區輪流負責舉辦年會。自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九年，西南軍閥史研究會先後在六個相關省區舉辦了六次學術討論會，並在會後集結論文出版《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四輯。<sup>10</sup>此外，川、滇、黔、桂、粵、湘六省區亦陸續成立各「西南軍閥史研究分會」，推動各省區的軍閥史研究工作及撰寫各省軍閥史，以做爲最後編著《西南軍閥史》的準備工作。這種集結衆多人力及大規模的分區合作，是大陸學界在西南軍閥史研究

<sup>8</sup> 孫代興：〈西南軍閥史研究述評〉，張憲文等編：《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月，一版），頁三七。

<sup>9</sup> 西南軍閥史研究會：《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一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一版），〈編後記〉，頁四七九。

<sup>10</sup> 西南軍閥史研究會：《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一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二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三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五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其中第四輯及第六輯因故拖延未出。

上得以迅速展開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此情況下，有關西南軍閥史的研究成果即不斷湧現。據估計，僅在西南軍閥史研究開展的七、八年間，即有約兩百位研究者投身其中，撰寫了三百多篇學術論文，約三百萬字；已出版的四輯《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共收錄論文一百餘篇，約一百二十餘萬字。<sup>11</sup>在此基礎上，西南地方史及軍閥史的新著紛紛問世。在地方史方面，如由隗瀛濤、李有明、李潤蒼主編的《四川近代史》於一九八五年出版；<sup>12</sup>周春元、何長鳳、張祥光主編的《貴州近代史》於一九八七年出版；<sup>13</sup>《雲南近代史》編寫組所撰寫的《雲南近代史》則於一九九三年出版。<sup>14</sup>在軍閥史方面，貴州軍閥史研究會與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寫的《貴州軍閥史》於一九八七年出版；<sup>15</sup>匡珊吉與楊光彥主編的《四川軍閥史》於一九九一年出版；<sup>16</sup>莫濟杰與陳福霖主編的《新桂系史》第一卷亦於一九九一年出版；<sup>17</sup>至於《雲南軍閥史》則早已編妥，然因內部問題一直無法付梓。<sup>18</sup>在軍閥人物方面，研究成果更是豐碩。雲南學者謝本書專研滇系軍閥，先後出版專書多種，如一九八三年《蔡鍔傳》；<sup>19</sup>

<sup>11</sup> 孫代興：〈西南軍閥史研究述評〉，頁三八。

<sup>12</sup> 隗瀛濤、李有明、李潤蒼主編：《四川近代史》（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版）。全書約六十萬字。

<sup>13</sup> 周春元、何長鳳、張祥光主編：《貴州近代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九月，一版）。全書約三十三萬餘字。

<sup>14</sup> 《雲南近代史》編寫組：《雲南近代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月，一版）。全書約四十七萬餘字。

<sup>15</sup> 貴州軍閥史研究會、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貴州軍閥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一版）。全書約三十二萬字。

<sup>16</sup> 匡珊吉、楊光彥主編：《四川軍閥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一版）。全書約五十萬字。

<sup>17</sup> 莫濟杰、陳福霖主編：《新桂系史》，第一卷（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一版）。全書約三十一萬餘字。

<sup>18</sup> 雲南政、學界因爲對於唐繼堯的評價不一，故而在處理軍閥史的問題上頗感棘手，遂至延誤《雲南軍閥史》一書的出版。

<sup>19</sup> 謝本書：《蔡鍔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一版）。全書約十二萬字。一九九七年作者在前書的基礎上，增補完成《討袁名將——蔡鍔》（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一版）一書，全書約十九萬餘字。

一九八五年《唐繼堯評傳》；<sup>20</sup>一九八八年《龍雲傳》；<sup>21</sup>一九九〇年《盧漢傳》（與牛鴻賓合著）；<sup>22</sup>一九九三年《張冲傳》。<sup>23</sup>其中尤以《唐繼堯評傳》一書引起的迴響最大，論者以為該書作者透過對唐繼堯的成長、崛起、蛻變、衰亡史的評述，對於民國史上軍閥統治此一特殊歷史現象，做了較深入的分析，並探索其規律性，頗引起一些學者對軍閥史研究的濃厚興趣。<sup>24</sup>在川系軍閥方面，喬成、楊續雲於一九八七年出版《劉湘》一書；<sup>25</sup>蕭波與馬宣偉合著有《四川軍閥楊森》；蕭波、馬宣偉另於一九八四年及一九八六年分別出版《四川軍閥混戰》二卷本。<sup>26</sup>在桂系軍閥方面，陸君田與蘇書選於一九八七年出版《陸榮廷傳》；<sup>27</sup>在黔系軍閥人物方面，熊宗仁於一九九一年出版《何應欽傳》。<sup>28</sup>這些著作的問世，使西南軍閥史研究的縱深有了更大的發展。在此基礎上，總結大陸學者近十餘年來對西南軍閥史研究成果，由謝本書、馮祖貽主編的《西南軍閥史》三卷本，第一卷已於一九九一年出版，第二卷、第三卷則同時於一九九四年出版。<sup>29</sup>《西南軍

<sup>20</sup> 謝本書：《唐繼堯評傳》（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二月，一版）。全書約十五萬字。

<sup>21</sup> 謝本書：《龍雲傳》（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六月，一版）。全書約二十萬字。

<sup>22</sup> 謝本書、牛鴻賓：《盧漢傳》（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十月，一版）。全書約二十一萬餘字。

<sup>23</sup> 謝本書：《張冲傳》（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一版）。全書約四十二萬字。

<sup>24</sup> 孫代興：〈西南軍閥史研究述評〉，頁三八。

<sup>25</sup> 喬成、楊續雲：《劉湘》（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一版）。全書約二十五萬字。

<sup>26</sup> 蕭波、馬宣偉：《四川軍閥混戰（一九一七年～一九二六年）》（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版）。全書約二十三萬字；《四川軍閥混戰（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四年）》（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一版）。全書約二十二萬字。

<sup>27</sup> 陸君田、蘇書選：《陸榮廷傳》（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九月，一版）。全書約二十九萬字。

<sup>28</sup> 熊宗仁：《何應欽傳》（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一版）。全書約六十三萬字。

<sup>29</sup> 謝本書、馮祖貽主編：《西南軍閥史》，第一卷（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閥史》三卷本共約一百萬字，這部卷帙浩繁的史著之付梓，不但代表大陸史學界對西南軍閥史研究的具體成果，也標誌此一領域之研究已正式邁入另一新里程。

至於臺灣史學界研究軍閥史，由於起步較晚，尚多偏重於北洋人物的探討；對於西南軍閥史研究，僅有一些零星專著及數篇碩士論文，嚴謹而有系統的論著並不多見。在湘系軍閥方面，有蘇澄基的〈趙恆惕與湖南自治〉（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六十一年）、劉鵬佛〈譚延闓與民初政局〉（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六十八年）及葉惠芬〈唐生智與北伐前後政局〉（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一年）等文。粵系軍閥方面，幾乎完全集中於陳炯明的研究上，有陳曼玲〈陳炯明與粵軍〉（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二年）及張世瑛〈陳炯明研究——以孫陳關係為中心的探討〉（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三年）等文，另有修金莒〈陳濟棠與廣東政局〉（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六年）一文。在桂系軍閥方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浚源於民國八十四年一月出版《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一八六〇～一九三七）》一書，對廣西近代歷史及桂系軍閥有全面的探討。此外，還有黃益謙〈陸榮廷與廣西〉（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五年）及王文裕〈北伐前後的桂系與國民政府〉（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一年）等文。滇系軍閥方面，有拙著《唐繼堯與西南政局》一書。<sup>30</sup>川系軍閥方面，韓靜蘭〈抗戰前後中央政府與四川的軍政關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二年）一文有初步的探討。至於黔系軍閥方面，至今仍無研究成果出現。是為臺灣學界對西南軍閥史的研究現況。

二月，一版），全書約三十五萬字；《西南軍閥史》，第二卷（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一版），全書約三十萬字；《西南軍閥史》，第三卷（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一版），全書約三十五萬字。

<sup>30</sup> 拙著：《唐繼堯與西南政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初版）。本書係筆者碩士畢業論文增補出版。

### 叁、研究觀點

由於西南軍閥史研究的重鎮與主要成果皆來自於大陸學界，是以本節將集中探討大陸學界對於西南軍閥史研究的主要觀點。這些觀點經歸納整理為以下四點：

#### 一、研究西南軍閥史的意義

長期以來大陸史學界只注重研究「革命史」。所謂革命史，在清中葉以後（即所謂「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係指五次對外戰爭（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之役）、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及一次戊戌變法。在辛亥革命後（即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主要是指五四運動、中共興起、國共合作與北伐戰爭、國共分裂與中共蘇維埃政權的出現、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等事件。由於偏重革命史的研究，如此一來，遂使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這一段歷史幾乎等於空白；從五四運動以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三十年間，有關北洋軍閥及國民黨統治的具體情況亦甚少叙及。是以榮孟源即指出，不論就革命史或中共黨史的研究而言，實有深入探討軍閥時期歷史資料的必要。西南軍閥史研究會的成立及相關研究的推動，不但擔負起西南六省軍閥史研究的重任，更有填補過去歷史研究的空白，開闢史學工作新陣地之積極意義。<sup>31</sup>

再則，近代中國軍閥實係中國近代社會的特殊產物，剖析近代中國軍閥，研究其產生的歷史根源以及從興起到覆亡的全部歷程，將能更有助於對中國近代社會的深刻瞭解。<sup>32</sup>而且軍閥實為歷史上的一個客觀實體，亦為中

<sup>31</sup> 榮孟源：〈要重視西南軍閥史的研究〉，《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二輯，頁一〇～一一。

<sup>32</sup> 《貴州軍閥史》，〈前言〉，頁一～二。

國近代歷史進程的組成部份。若因軍閥乃負面反動人物遂對之不屑一顧，將使中國近代歷史出現一種嚴重的缺陷。西南軍閥史研究的倡議，自然能對前述問題作出其應有的貢獻。

#### 二、軍閥及「西南軍閥」的定義

研究軍閥史，首先必須對「軍閥」一詞有明確的定義。李新認為軍閥需具有三個特徵：擁有自己的武力，佔據若干地盤，並且在他們勢力所及的地區實行個人專制的直接軍事統治。<sup>33</sup>這三個軍閥的特徵簡言之，即「私軍」、「地盤」、「武治」。一般史家對前二者多表同意，但對第三點則有意見，如來新夏即認為軍閥中亦有人行「文治」者，如閻錫山、陳炯明之流。且軍閥之存在實有其理論基礎，此即以儒家文化為中心，以封建倫常關係為紐帶而自成體系，沒有體系即不能稱之為「閥」。<sup>34</sup>謝本書與王永康則將構成軍閥的要項歸納成五點：一、有槍有隊伍，擁軍成閥；二、割據一塊地盤，有權有勢；三、和地主豪紳買辦勾結，對外還投靠帝國主義；四、徵兵徵糧徵稅，殘酷壓榨人民；五、爭權奪利，彼此混戰。<sup>35</sup>這些論點似乎尚未能完全深刻概括民國史上軍閥的本質特徵，學界對此亦尚未形成一致的見解，是以有關軍閥的基本概念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探討。

至於何謂「西南軍閥」？謝本書、王永康認為西南軍閥是民國初年軍閥統治時期，相對於北方的北洋軍閥，南方即有所謂的「西南軍閥」。自護國之役袁世凱去世後，不但北方政局為北洋軍閥所控制，即在中國西南各省——雲南、四川、貴州、廣西、廣東、湖南等省區，亦形成相對獨立的各

<sup>33</sup> 李新：〈北洋軍閥的興亡〉，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九月，一版），〈代序〉，頁一。

<sup>34</sup> 來新夏：〈略論民國軍閥史的研究〉，《上海學術月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頁四一。

<sup>35</sup> 謝本書、王永康：〈西南軍閥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一輯，頁二五～二六。

地方軍閥，統稱之為西南軍閥。在西南軍閥中，又以雲南唐繼堯的滇系軍閥及廣西陸榮廷的桂系軍閥勢力較大。從此，民國以來的統一政局遭到破壞，中國開始出現北洋軍閥與西南軍閥兩大派別。<sup>36</sup>後來謝本書更進一步闡釋，西南軍閥此一歷史概念主要並非是地理概念，「而首先是一個政治概念」。<sup>37</sup>西南軍閥係專指民國初年形成的與北洋軍閥相對抗的西南地方軍閥集團。在民初動盪的政治局勢下，西南各省軍閥與北洋軍閥在對待諸如護法、參戰等重大政治問題的態度上是有區別的，西南軍閥與北洋軍閥之間更有重大的利益摩擦（北方主統一，南方主分治）。在此情形下，將西南軍閥視之為有別於北洋軍閥的另一類型軍事集團加以研究，實有其必要。

### 三、西南軍閥史的上、下限及分期

關於西南軍閥史的上、下限，亦即其形成與覆亡的時間，大陸學者對此仍有很大的爭議。貴州學界編寫《貴州軍閥史》一書時，將一九一二年唐繼堯率滇軍入黔，傾覆貴州軍政府，取貴州都督而代之視為貴州軍閥統治的開端，一舉將軍閥時期的上限推至一九一二年，一部民國貴州史即是軍閥統治史。<sup>38</sup>然而四川學界編寫的《四川軍閥史》，卻將四川軍閥的形成定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唐繼堯編組靖國軍，對四川發動「靖國戰爭」之時。<sup>39</sup>謝本書與王永康則認為西南軍閥醞釀於一九一一年，形成為一九一六年，最後覆滅於一九四九年，其間劃分為四個時期：一、西南軍閥的醞釀形成時期（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六年）；二、西南軍閥的發展時期（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七年）；三、西南軍閥的繼續時期（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四、西南軍閥的尾聲（一九三七～一九四九）。<sup>40</sup>楊維駿則認為西南各省軍閥史的上限未必

<sup>36</sup> 同前註，頁二六。

<sup>37</sup> 謝本書、馮祖貽主編：《西南軍閥史》，第一卷，〈前言〉，頁一。〈前言〉係謝本書執筆。

<sup>38</sup> 《貴州軍閥史》，頁三四～四二。

<sup>39</sup> 《四川軍閥史》，頁八九～九九。

<sup>40</sup> 謝本書、王永康：〈西南軍閥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二八～三〇。

劃一，各省情況有所不同，必須對西南各省自辛亥革命後的情況做具體分析，來研究和劃分各省地方軍閥統治史的上限。<sup>41</sup>不過楊維駿亦認為西南軍閥史的上限應該不會早於護國戰爭，因此將上限定於護國戰爭之後，應較符合歷史的實際狀況。

至於西南軍閥形成的重要標誌，謝本書認為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一九一六年護國戰爭，雖是西南軍閥的醞釀期，但一九一七年在四川成都所爆發的川、滇、黔軍混戰，則是西南軍閥正式形成的重要標誌。按護國運動爆發後，雲南迅即編組護國軍出兵川中，護國黔軍隨亦入川，與滇軍併肩作戰。未及，川軍劉存厚等部亦響應護國，滇、黔、川軍在四川戰場上共同攜手與北洋軍相抗。及至護國之役結束，北洋軍立即撤離；孰料滇、黔軍不但不撤，反而有長駐川中的打算，遂因地盤私念與川軍爆發內戰。<sup>42</sup>此後西南局勢一變，自護國之役以來川、滇、黔三省合作對抗北方的局面就此打破，正式標誌西南軍閥的形成。<sup>43</sup>

### 四、南北軍閥的異同及對軍閥人物的評價

關於西南軍閥與北洋軍閥的異同，謝本書與王永康認為做為地方軍閥，西南軍閥與北洋軍閥並無本質的不同，「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對內與封建勢力相勾結，壓迫剝削人民，這是它們的共同點。」<sup>44</sup>然而二者之間仍存在著某些差異，謝本書在另一篇文章中即指出，北洋軍閥率皆出身袁世凱的小站系統，自清末以來即站在統治者立場，反動性、保守性色彩濃厚。而西南軍閥的出身經歷卻要更為複雜，其中一些人士如唐繼堯、陳炯明早年皆曾參加革命黨，並參與辛亥革命、護國戰爭等革命事業，不能說完全無功。必須對

<sup>41</sup> 楊維駿：《西南軍閥史的上限》，《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一輯，頁三四～四二。

<sup>42</sup> 楊維真：《唐繼堯與西南政局》，頁一三五～一四九。

<sup>43</sup> 謝本書：〈西南軍閥形成的重要標誌〉，《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三輯，頁一八～三一。

<sup>44</sup> 謝本書、王永康，前引文，頁三二。

這些人物採取更細部的研究，探討其轉變為地方軍閥的整個過程。<sup>45</sup>

至於對軍閥人物的評價問題，謝本書、王永康認為應實事求是，並且要持慎重的態度。不能因其過而隱其功，也不能因其功而諱其過。謝本書、王永康並具體提出三條評價軍閥人物的標準：

一、在評價具體軍閥人物時，要視其對待中國人民革命的態度如何？如果同情甚至參加革命鬥爭，即應加以肯定，反之則應予以批判。

二、軍閥人物同情甚或參加革命鬥爭，應就其動機及客觀後果一併進行考察。若其動機係為其個人的利益，而客觀後果卻是良好的，對革命過程起了好的作用，就應以客觀後果作為評價的主要尺度。

三、對於軍閥人物不要就一時一事，而應就其一生的全部活動、功過進行評論。只要其一生活動中功大於罪，即應予以肯定，反之即應批判其罪行劣跡。<sup>46</sup>

西南軍閥由於派系眾多，不似北洋軍閥為一整體的軍事集團，故而西南軍閥人物更具其複雜性與特殊性。西南軍閥各派系除具有共性（共同的本質特點）外，還有各自的個性（不同的特點），如黔系軍閥的依賴性，湘系軍閥的兩面性，滇、桂軍閥的獨立性等。是以在分析、評價西南軍閥人物時，恐需更加注意其複雜性與特殊性。

## 肆、幾點商榷

關於大陸學界對於西南軍閥史研究的重要觀點已見前文，然而其中卻有若干觀點頗有再加商榷之餘地，茲臚列於下：

### 一、軍閥史的分期問題

<sup>45</sup> 謝本書：〈略論南北軍閥的異同〉，《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二輯，頁三九～四七。

<sup>46</sup> 謝本書、王永康，前引文，頁三一。

就一般觀念而論，史家多認為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軍閥統治時期」是始於一九一六年袁世凱去世，止於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此後中國國民黨厲行「以黨領政」，國民黨「黨治」取代軍閥統治，成為歷史的主流現象。而原先的地方軍閥亦在國民政府成立後，蛻化為國府治下的地方軍人，即所謂「地方勢力」或「地方實力派」。然而在實際上，「軍閥」與「地方實力派」有時卻不易截然劃分。如謝本書在總結「西南軍閥史」研究成果而編寫的《西南軍閥史》（第一卷）一書中，將西南軍閥的發展一如前文所言分為前述四個階段：一、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六年醞釀時期（即背景）；二、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七年為形成及發展時期；三、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為繼續時期；四、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為西南軍閥的尾聲。謝本書認為研究西南軍閥史最主要的時期是第二及第三階段，至於背景及尾聲則因缺乏獨立性而非研究重點。<sup>47</sup>此處謝本書無疑地將中國的軍閥時期延長到一九三七年，甚至到一九四九年，並把「地方實力派」視同「軍閥」（尤其在西南軍閥發展的第三階段）。一九九〇年謝本書在與牛鴻賓合著的一本研究國民政府時期西南地方實力派的重要專著《蔣介石和西南地方實力派》一書中，將其觀念有了更進一步的釐清。謝本書認為西南軍閥是西南地方實力派的前身，而西南地方實力派則是從西南軍閥演化而來的。至於西南軍閥轉化為西南地方實力派的關鍵，則是在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全面開展以後。<sup>48</sup>謝本書仍將一九三七年以前國民政府治下的西南「地方實力派」視同「軍閥」，這無寧是一個尚待釐清的問題。

筆者先前在撰寫《唐繼堯與西南政局》一書時，曾對軍閥生存的環境細加思索，發覺民初西南軍閥之所以有其生存空間，實由於當時中國政局的混亂。自一九一七年後，在長期的分裂下，南北各有其政府，各自以「法統」相號召，西南軍閥遂得以「護法」之名，行擴張之實，並假南方軍政府對抗

<sup>47</sup> 《西南軍閥史》，第一卷，〈前言〉，頁一〇～一三。

<sup>48</sup> 謝本書、牛鴻賓：《蔣介石和西南地方實力派》（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十月，一版），緒論，頁一二～一三。

北京政府的壓力，從而合理化其作為。<sup>49</sup>然而此種景況在北伐之後開始有了改變，南京成爲唯一的法統所在，各地方軍人雖屢對中央權威挑戰，但大體上南京國民政府仍能保持中央政府的態勢。侵奪鄰省的行徑是南京中央所絕不容許的，而國府對此類挑釁則以強力對付。甚至隨著南京政權的日益鞏固，國民政府乃開始試圖控制地方。此際西南四川、雲南等地方軍人限於本身力量不足，實無意挑戰中央權威，只有分省盤據，並遵奉南京國民政府的號令。依此而論，一九二八年以後的西南整體形勢已有很大的轉變，實有與先前軍閥時期做一區隔之必要，而以「地方實力派」（或「地方勢力」）取代「軍閥」做爲論述的主體，應是較合理的安排。

## 二、軍閥與列強的關係

在研究軍閥史的大陸著作中，絕大多數在處理軍閥與列強的關係時，很難擺脫傳統反帝國主義的濃厚觀念，而能持平地論述二者之交往。譬如前文述及謝本書、王永康論及軍閥構成的五要項，其中之一即爲「勾結地方豪紳買辦，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實則其中尚有錯綜複雜之內情。即以筆者曾經研究過的雲南唐繼堯而論，唐繼堯由於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在其主滇後大力延用留日學生，亦曾延攬日籍軍事顧問，與日人維持不錯的交情。而雲南向來與法屬安南關係密切，唐繼堯亦刻意與法人交好，故外界多將唐氏視之爲親日、親法派。然而唐繼堯自青年時代，即對帝國主義欺凌東方民族深感不滿。一九〇九年唐繼堯自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返國，途中取道仁川、漢城，經東三省歸國。在遊韓時，因見當時日人統治朝鮮情勢，曾作有《遊

<sup>49</sup> 參閱楊維真：《唐繼堯與西南政局》，頁一三二～一三四。陳志讓曾以「合法有道」此一觀念檢視民初軍閥政治，這個觀念和中國傳統政治的「正統論」有些相似處，亦即北京的中央政府擁有政治上的正統，並且是全國「合法違法、有道無道的最高裁判所」。及至一九一七年孫中山南下護法，並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一時之間中國乃有兩個政府，兩個法統。詳見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三年九月，一版二），頁一六～一八。

韓感賦》一詩：

悲水愁山幾繼腸，天公何獨罪東方？蒼生苦惱人相食，猶自笙歌祝虎狼。衣冠猶是漢威儀，對此如何不淚垂。大陸龍騰三萬里，快分霖雨潤藩籬。<sup>50</sup>

唐繼堯因有感於朝鮮亡國之痛，因此日後對次韓國復國志士乃多方資助。雲南陸軍講武堂在唐繼堯主政時期，第十四、十五兩期曾培植不少韓國學生，當時凡持有韓國臨時政府（成立於上海）證明文件的韓國學生，唐繼堯悉收納於所辦的講武堂，前後畢業者達五十餘名。<sup>51</sup>此外，雲南各級軍事學校亦培養若干安南學生，扶助其獨立運動。如此是否可以論定唐繼堯對外勾結、投靠日、法帝國主義？當日地方軍閥必須與列強維持良好關係，應係基於現實考量，蓋不論是舉借外債抑或是購買外國軍火，都必須取得外國的同意。如雲南若與法國關係不佳，法方只需斷絕滇越鐵路交通線即可扼制滇之死命；在此情況下，任何雲南主政者皆需維持與法方之良好關係。是故此乃結構性的問題，而非關個人道德良善與否。

## 伍、未來展望——代結論

西南軍閥史研究在史學界，尙是一新興的研究課題。西方學界雖有開創之功，但真正蔚爲研究熱潮，還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大陸學界。經衆多研究者的投入，專業研究團體的成立，以及大規模的分區群體合作，研究成果陸續出現。論者指出，此階段大陸學界在西南軍閥史研究上取得的進展和成果，大致有三：（一）學術組織迅速建立，研究隊伍不斷壯大；（二）研究成果不斷湧現，深化西南軍閥史的研究縱深；（三）活躍了西南地區史學學術活

<sup>50</sup> 唐繼堯：〈東大陸主人言志錄〉，附於《唐繼堯》（臺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月）一書之末，頁一四六～一四七。

<sup>51</sup> 閔石麟：〈中國護法政府承認韓國臨時政府始末記實〉，《春秋月刊》，第一卷第五期（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一日），頁九～一一。



動，促進各省區學術交流。<sup>52</sup>經十數年的努力，西南軍閥史研究可謂終有小成。

然而正因為此一研究領域開創迄今不過十餘年的時間，西南軍閥史研究尙處於開拓階段，其研究成果不論在廣度或深度上，皆有繼續精進的空間。未來西南軍閥史此一研究領域可待拓展者，一為充實理論的探討，一為開闢新的研究取向。就前者而言，西南軍閥史相關理論的研究，實為奠定此一領域研究成果良善與否的重要基礎。對於軍閥的性質、軍閥形成原因、軍閥特色等論題，若無法從理論研究上尋求突破，得到共同的見解，對於其他相關論題的深入探討亦將受到限制。就後者而言，目前有關西南軍閥史的研究成果多集中於政治、軍事層面，尤其偏重於軍閥人物的探討；對於孕育軍閥產生的社會環境、經濟背景、文化現象等方面，則較少留意。如此則只見到浮面的、點狀的研究，較少真正具有堅實基礎的重要著作。因此，如何深化研究成果，開拓新的研究方向，實為西南軍閥史研究當務之急。

<sup>52</sup> 孫代興：〈西南軍閥史研究述評〉，頁三七～三九。

## 評 論

陳 存 恭

楊維真博士是民國史後起之秀，對西南區域歷史如雲南區域現代化、雲南軍閥、唐繼堯、龍雲各方面的研究很有成就，發表過專著及博士論文，他非常用功，多次到雲南蒐集資料，和研究西南歷史的學者討論問題，本文介紹大陸有關「西南軍閥史」的研究，並展望未來，讓我們分享他的收穫。

論文主要是學術成績的報告，雖然前面提到一九七〇年代美國學者有關西南軍閥的著述，也提到在臺灣有關西南軍閥的研究所論文，但未進一步去評論，而且有關臺灣的研究介紹也不全，如朱浚源研究員對廣西的研究很多，沒有列入，可見本文主要在於介紹大陸的研究作品。

楊博士本文介紹多，評論也有，誠然西南軍閥史有研究的意義與價值，關於「西南」地域，過去兩廣與中央對抗時，組織西南政務委員會，是有意擴大兩廣政治版圖，將雲、貴、川都列入「西南」，大陸雲、貴、川、桂、粵、湘等省歷史學者組織「西南軍閥史研究會」，顯然又將湖南併入，不過從地理上，廣東一般稱為華南，湖南屬於華中，算不算「西南」是一個問題。

楊博士對大陸論著提出兩個商榷的問題，其一是分期，的確，如論北伐後許多軍系（包括新舊軍系）仍然維持其半獨立的狀態，仍可說是軍閥，但不久全面抗日爆發，所有軍系投入抗戰，犧牲奮鬥，就不能說是軍閥了，是以稱之為「地方實力派」或「軍系」都可以，而軍閥時期下限，也與大陸的論定有所不同。

其二，論軍閥與帝國主義關係，楊博士對大陸學者對「唐繼堯親日」的論斷有所質疑，這與敝人研究「列強對中國的軍火禁運」的結果是符合的，國民黨及共產黨都認為每個軍閥的背後都有帝國主義者撐腰，其實沒那麼簡單，其間存著錯綜複雜的關係。

提到這點，就牽涉到「軍閥」的定義了，本來軍閥是指擁有私軍，轄有

地盤，行使其獨立或半獨立政權的軍人，原無褒貶意味。但我國對軍閥則含有禍國殃民的意義，謝本書對「軍閥」的定義即是如此，所以抨擊軍閥爭權奪利，壓榨人民，這方面值得進一步去討論，謝本書、王永康等似乎深受馬列思想、中共革命的影響，是以對軍閥人物的評價，所謂功過是非最重要的標準是「對待中國人民革命的態度」，因此那些投靠中共，幫助「反蔣」的軍閥，在大陸歷史紀錄上都成為有功的好人，如此好人壞人，有功有過完全根據「革命史觀」，「鬥爭史觀」，充滿意識型態，可評為受政治污染，這是我們對於大陸史著應留意之處。

楊博士限於篇幅沒能介紹研究「史料」，不過對所介紹的史書，究竟所根據的史料是什麼？基於什麼史料，用什麼方法、理論，提示什麼結論？這些都是相關的問題，譬如D.S.Sutton關於滇軍的著作，利用了英、法資料，謝本書所用的資料應該很豐富，值得介紹。

總之，本文介紹大陸西南軍閥史研究概況，是一篇好的報導，可以質疑的不多，只是對評論方面作一些補充。